

# 现在不想写论文

● 崔 同

前不久,一位上过党校的好友,来看望正在党校学习的我。

朋友见面,自然是无话不谈。他提醒我:“你们毕业时肯定是要交论文的,晚写不如早写。”

我知道这话出自一片好心,兴许还是经验之谈。

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却没能听从他的好言相劝。

没听劝,不是因为我不大会写论文。我大学中文系毕业,又当了十来年省报编辑、记者,不仅新闻报道编过写过,而且理论文章也编过写过,现在又捞了个理论部“主任编辑”的头衔,照理说,写篇论文是不应该犯难的。真的,倘若我连论文都不会写,恐怕早就丢“饭碗”了。

没听劝,也不是没有写作的客观条件。我住在绿树掩映的楼房里,一人独间,夏天有风扇,冬天有暖气,书桌,书架,台灯,样样齐全。虽说规定晚上10点就寝,可你若真是写到夜里两点,恐怕也没人来干涉。党校里,有资料齐全的图书馆、阅览室,管理人员那不厌其烦帮你找书、取资料的热情,使你觉得别说写篇论文,就是写出文山书海,大概也不在话下!

没听劝,更不是没有写作时间。党校的课尽管安排得很紧,但紧也紧得有规律。只要你“不饱食以终日”,想写篇论文,时间总是可以挤出来的。

不写论文,主要是时下与论文有关的事把我的心给搞乱了。

前不久,读到一篇讨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论文。该文意在提倡复兴儒学。其论据之一,是新加坡经济就是靠复兴儒学发展起来的;论据之二为,依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必将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我未到过 新国,不敢断言新加坡经济的发展与儒学无关,但若说该国经济全是靠复兴儒学才发展起来的,恐怕就有“论偏”之嫌了。为证实我的想法,我翻了一遍《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感到这位新加坡资政在那厚如砖头的论著中,强调的“新加

坡经验”并非发展儒家学说,而是发展现代科技,发展现代教育。不知这该作何解释?记得几个月前,新国要根据本国法律对一个美国青年施行鞭刑,搞得世界为之大惊,连美国总统都出来干预。我孤陋寡闻,不曾知晓儒家学说在何处提倡过鞭刑,只清楚法家提倡以法治国。新加坡这样做是不是把法家提倡的东西误认为儒家了,我不可知。还有,提倡复兴儒学,是不是要用鞭刑发展经济?也不可知。至于第二个论据,我更有想不通之处。“三十年河东”说作为一种形象化说法,既包含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向相反方向转化的辩证思想,又有“因果轮回”迷信色彩。当前世界文化的趋势是多元化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的论家为何要去宣扬“轮回”思想呢?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固然有其精华,但糟粕也不少,我们的论家为什么要把儒学捧上天呢?难道他们不晓得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嘲笑过“胡说一通”的“圣人之徒”吗?

还有个例子,是讨论科举制度对今天有多少积极意义。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确也起过积极的作用。它将选拔官员同学校教育、考试制度结合起来,消除了“提拔”中的长官意志,为平民提供了进仕的机会;它考试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以防营私舞弊等等,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但是,这一制度一开始就有消极因素。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端和衰败愈加明显,它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带来的身体摧残难以言表。对这样一种“习所非所用”的考试选拔制度,却有论文倍加赞赏,还提出要把科举制度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我们今天的干部选拔制度中来。我不否认我们今天的干部选拔制度存在不少问题,也不反对对此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但若把科举制度照搬到今天,结果会怎样呢?我不知道如此“解放思想”的论者记不记得顾炎武老先生当年的感慨:“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日知录》卷十八)“从

# 舞盲·法盲·党盲

陈鲁民

单位里正在组织扫舞盲和扫法盲活动。对于前者,我虽参加了几回,终因提不起兴趣,没能坚持下去;对于后者,我倒很是积极,听课讨论,一次不拉,人虽笨些,但下死劲学了一个月,《民法》《刑法》倒也了然于胸,并引发了继续钻研的兴趣。

在这之前,单位还扫过科盲、外语盲、电脑盲,收获如何,各人情况不同。“盲”之类词汇,是近年来新出来的,《辞海》上无从查究。依我理解,如果对某些基本的知识技能不会不懂,便可称“盲”,于是便有法盲、舞盲、史盲、棋盲、科盲之说。比如,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可谓文盲,不知道李政道的堪称科盲,问“李时珍来开会了没有”的算是史盲,不知法不懂法的自然也很难守法的当为法盲,不会快三慢四的自然舞盲,一上桌就打颤一端杯就脸红的那是酒盲。

近日又闻“党盲”之说,提法虽未见科学,但想想也不无道理。据悉,某系统曾对本系统党员进行党的

基本知识测试,其及格率不足50%,说那些不及格者是“党盲”大概算不得委屈。

作为党员,首先要“知党爱党”,知之愈深,爱之愈切。自然,党员不是圣贤,不可能样样都懂行行都会,但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胜任本职工作,至少应懂得党的基本知识、党的历史,熟悉党纲党规,千万不能做“党盲”。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还应学些科技常识、法律知识、历史知识,不做科盲、法盲、史盲。而眼下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有些党的干部,对扫“党盲”“法盲”之类毫无兴趣,而对扫“舞盲”“酒盲”“牌盲”却瘾大得很,“早上轮子转,中午盘子转,晚上裙子转”,不仅大大损害了党的声誉,也影响了党的事业。对党的知识一问三不知的“党盲”,干脆扫地出门,请他走路。因为列宁

早就说过:“徒有虚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

(责任编辑 程永强)

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终矣。”(《经义策论》)

至于拉古人这“大旗”,做今人之“虎皮”,卖论赚钱者,更不乏一二。你说要加强企业管理,就有论称《易经》是企业管理百科全书;你讲经营之道,就有论称一本《三国》胜于任何现代经营教材;你提倡环境保护,就有论称荀子是提出生态伦理思想的世界第一人。不错,《易经》有企业管理思想的萌芽,《三国》中有处世之道,荀子有原始朴素的生态意识,但它们与现代要求毕竟还有很大差距。弘扬中华文化无可厚非,但若“弘扬”得过分,会适得其反。读罢上边所说的“大旗”式论文,不是有人真的以为远古时代就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三国时已经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先秦时期已是环保楷模了吗?

应该说,在“双百”方针指引下,近几年广大社科工作者经过努力,写出了不少有科学价值的论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假、旧、狂、空”的论文毕竟只是少数。但正是这少数,让我这“刀笔小吏”心惶惶然。

以前总觉得自己能写,现在忽然觉得不是那回事。你素爱备至的东西,说不定正是老百姓不买账的东西!听人讲,有位领导同志在民间考察时,曾询问一位普通工人:“你说现在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回答是“你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你说现在是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我们(我也是参与者)宣传了那么多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宣传了那么多遍社会主义优越性,此君一句话,使我的心变得有如枯井。过去,因自己是搞思想宣传工作的,就把思想工作夸大得神乎其神,现在又觉得“好说已长便是短,自知已短便是长。”写篇论文发表,是不是就像早晨摆摊卖油条一样,把油条用纸一卷递给买者,人家把油条三口两口一吃,顺手把包装纸一揉扔进垃圾箱啦?——过不了几日,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我知道,这个想法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可我毕竟至今还没能从这一极端中走出来,还未找到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故而,提笔写论文,觉得很难。

(责任编辑 程永强)